

文 革 博 物 馆 专 集 (三 十 六)

——J. F. 肯尼迪（1917—1963），曾任美国总统，摘自

1962年3月13日于白宫的演说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作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温良恭俭让。
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

——毛泽东（1893—1976），曾任中国共产党主席，摘自《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两岸开放之后，当《城南旧事》的作者，对北平情有独钟的台湾林海音女士被问到为何不回北平看一看的时候，她的回答是：“我的城门楼子呢？”一语道尽了全部的辛酸。扒掉的城门楼子，不仅仅是扒掉了她对幼时的幻梦，终于使她归意阑珊。我这次去国到北美快十个年头了，也有人问我是否什么时候回去看看据说发展很快的北京，我的回答是：“我的文革博物馆呢？”使我归意阑珊的是挥之不去的文革幽灵。

实际上，八五年秋，在德国学习完毕之后，我还是毫不迟疑地打起行装，牵着妻子的手，一同回到阔别数年的北京。旧日的朋友少不得聚会一场。一位在我走后已名满京城的作家朋友眼皮抬也不抬地对我说：“文化革命中，我们有的朋友总是责怪上一辈：当初你们回国来干什么？我看，你儿子总有一天会问你这样的问题。”

当时我只是付之一笑，但“六·四”的一声枪响把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送来的马列主义粉碎得无影无踪。当我被街上草草剥剥的枪响和声嘶力竭的哭喊从睡梦中惊醒，望着身边也被惊醒的妻儿，首先想到的就是这位作家朋友当初的话，此时他业已身到北美。

最近在网上读到北美有了沙盘推演的专家，终于从学术上证明了，在“六·四”的关键时刻，学生的所作所为使得政府除了下台之外只有开枪一途。我不禁想到，那么推而广之，若是林彪当年不去谋害伟大领袖毛主席，若是刘少奇对毛主席绝对俯首称臣，若是京汉铁路工人不罢工，若是刘和珍与她的同学们没有到总理府去请愿，甚至若是康、梁等人没有公车上书，……。或许这谈得太远了。但我记得，就在“六·四”开枪之前不几天，不知为何，一张党报上居然刊登了段祺瑞的子女回忆当年惨案的文章，指在学生与军警冲突达到高潮之际，有军警情绪失控，开枪射击学生。段祺瑞在后堂听到之后捶胸顿足，连连叹道“坏了我一生的名节”云云。无论事实果真如此，或是段祺瑞的后人为先人遮羞，段祺瑞最终是离开了总理府，鲁迅先生的千古文章也上了我们的课本。

巴金先生倡议建造的文革博物馆，在雨后春笋般的高级饭店纷纷落成之后仍无半点动工的意思，淡淡的血迹很快就了无痕迹。记得还是在国内读书的时候，湖南家乡的熟人来访，讲起了玩笑。说是文革之后一群文艺界湖南籍同人在京城湖南饭馆“曲园”聚餐，庆祝劫后余生。“三家村”的廖沫沙先生一到，看见济济一堂这许多人便作感慨状：“噢！还有这许多湖南人，看来还可搞得一次文化大革命！”后来我见到廖先生的女公子也未有机会求证此事。现在离我听到这则传言的时间也有十多年了。我在北美长大的儿子，不要说不知道林彪、江青是何方神圣，就是他也曾身历其境的“六·四”冲突中的精英，如若不是偶然听到在他看来已是老得掉牙的音乐录音，也绝对想不起来侯德建这位传奇式的人物。而我终于没有辜负我的作家朋友的责难，我的儿子再也不会问起那使我难堪的问题。但对于我曾度过童年与少年时代的土地上每每发生的冲突险情，血浓于水的亲情总是时时使我报以极大的关注。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向前看”最终没有使我们聪明多少，冲突一起便又是血流成河。

我愿把文化革命的点滴记忆放进网上虚拟的文革博物馆中，积少成多，总能警

诫一些世人，或许可以在下一次的冲突中少开一些枪，少流一些血。

文化大革命先期的“造反”往往是文革史家的焦点。而“造反”似乎是政治“成份”和“出身”之争的结果。所以谈文革，不谈“成份”和“出身”不行。网上对于文化大革命中那副对联，以及红卫兵的产生有了很多的讨论，尤其是德国仲维光先生的大作《“清华附中红卫兵小组”诞生史实》（载于本刊 z k 9 6 1 2 c——编者注）一文讲述了他清华附中当时的经历，文笔精彩，分析透辟，那里又是恶名昭著的红卫兵组织诞生的摇篮，对其本身似乎不用我再来续貂。后来又有一位徐女士提出不太相同的见解（见徐浩渊：《我的反思——给老三届的伙伴们》载于本刊 z k 9 7 0 6 d——编者注）。但都提到当时的局面很有些受到北京四中的影响。我本来想等一位四中的校友出来唱和一篇，但久等不至。于是我就不揣冒昧，回忆我所知道的一点情况。

人的“成份”，中国历来很注意。有所谓“九品中正”云云，以致有清一代便定下了铁帽子王，居然还可以“世袭罔替”。共产党本是一支农民起义式的组织，当然不脱中国自古就有的传统。但凡是一个新的朝廷建立，自要树立一个等级制度。分封元帅将军，制定二十几级的文官等级就是这一制度的外在形式。然而正当人们高唱“解放区的天是晴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仿佛跟着共产党走，共产党就一定会让你跟着走的时候，人们才发现，共产党还有另一套办法在组织着这一迅速壮大着的队伍。共产党不是傻子。今天老子得胜了，你跟我说坚决拥护共产党，要是明天国民党回来了呢，你会不会又坚决拥护国民党呢？中国的传统政治是你死我活的生存竞争，来不得半点疏忽。不能象在美国，今天你拥护民主党，四年以后，仅仅因为物价指数上升了两个百分点，你就转而投票支持共和党，这在我们用特殊材料制成的共产党人来讲是匪夷所思的，也是大逆不道的。那么，又如何来甄别这四万万五千万人呢？这就用得着唯物主义了。就是看你在我这里是得到的多呢，还是失去的多。共产党毫无疑意地相信这一点，“吃人家的嘴短，拿人家的手短”，而且还要作定量分析。失去五亩土地是富农，失去六亩就是地主了。共产党从马上得天下，一开始就划分成份，实际上他急于要知道的就是这个人海大国的每一份子对他的忠诚度。当然，后来发现自己也不是铁板一块，所以才有了除成份之外还有一个“站队”或曰“路线”的问题，所谓“路线对了头，一步一层楼”。指的就是这个意思。此是后话。

因此上，成份的划分实际上是除行政级别划分之外的一个忠诚度级别的划分。共产党认为这个系统才是真正有意义的系统。所以一个目不识丁，翻身作主人的街道委员会主任应该比一个行政十三级的公司留用经理更可靠。大概章乃器等人就是吃了不懂共产党这个道理的亏，以为他这个粮食部长够吵架的资格了。多少年之后，当我与章先生的公子章立凡在内蒙古的炕头上臧否时政时，他也承认乃父的莽撞。但是当“六·四”一起，这位公子又血脉贲张，以为有机会可以救天下了，充当起统战部长阎明复与天安门学生领袖们之间的传话人。但其后果则是阎先生丢了官，他也险些牵扯进去。这就是不懂共产党的游戏规则。所以毛泽东就反复地说：“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毛是不愿意把话说透，但是你自己得留神。

成份的问题如此重要，所以共产党从一掌权就在处心积虑地进行。在城市中，还有其他的尺度在衡量一个人的社会位置，比如你是美国留学，你可以是大学教授，一个月拿上三佰多块钱，共产党的书记有时也会对你笑上一笑；又比如你是国民党起义将领，你可以参加个民革，每个月去参加一次会，然后回家真心诚意地对家人说：“共产党硬是了不起！”其原因不外乎是张书记或者李支书让他也坐在主席台上了。

然而在乡间就没有这么舒服了。那里只有一个标准，就是成份。实际上在中国农村，自共产党一接手政权，成份问题就是那些手中有了几亩土地，又不舍得落荒

而逃的人们头上的紧箍咒。为了这道咒符，不知道死人凡几。直到今天，我们仍然无法确切得知，到底中国的乡村有多少仅仅因为成份一项而在共产党政权下亡命九泉的精确数字。在研究生院教我德文的一位专家，在参加土改运动时，曾亲眼见到在广西乡下把富农地主活活打死，然后把内脏挂到树上。我的一位好友，其父在抗日战争时是个共产党军队高级将领，进城后做到华东工业部的部长，但大灾荒的三年里也不敢接济乡下的祖父，只因其成份是富农，以致饿毙。对于统治者而言，如果说中国的老百姓是全世界最好的老百姓，那么，中国农村的老百姓则是这最好的老百姓中的皎皎者。他们是沉默的一族，你永远无法得知他们是如何承受难以想象的苦难。“成份”只不过是众多苦难中再加上已经看似无足轻重的一道枷锁。只是我们在哭诉自己不幸的时候很难听到他们的声音罢了。从王友琴先生的研究《“文革”中的迫害同学：事实与分析》（载于本刊 z k 9 7 0 7 d ——编者注）一文中就可以找到这样的例子：“在子女因父母而受迫害的事例中，最悲惨的可能是北京大兴县的“地富反坏”的子女。自 1 9 6 6 年 8 月 2 7 日至 9 月 1 日，大兴县的 1 3 个公社，4 8 个大队，先后杀害“四类份子”及其家属共 3 2 5 人。被杀死者中，最老的 8 0 岁，最小的是 8 天大的婴儿。有 2 2 户被杀绝。”

毛泽东早就说过：“中国有八亿人，不斗行吗？”山寨中火并不断，于是众好汉与喽罗们都有一个向山大王表示忠诚的问题。于是具备“成份好”的诸人最易于用这一利器作为护身盾牌。尤其是在火并中身不由己的上层天罡，弄不好连个地煞星也作不得，所以认真地落实“成份”，倒的确不失为一条保全身家性命的绝招。而且由此可以迅速找到可供攻击的对头——“成份不好”者，以攻为守。况且，这对手还没有交手就可以知道绝对是没有还手之力的，何乐而不为呢？于是在农村无往不利的“成份”法宝就在阶级斗争大师“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感召下推广到了城市。尤其是随着共产党的基本队伍自接手政权后响应“大干快上”的号召而大量产生的后代，此时已长大成人，这些子女也急于要认证自己的社会地位。不能够说“世袭罔替”实际上已经成为我们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天经地义，但倘若说真能够按照文革中的对联行事，那么就更加事半功倍了。实际上就我所见，至少在北京四中，文革前在这所共产党的要人子弟有如过江之鲫的中学，他们早已由善解人意的校方统统安排好了出路，不是上一流大学，就是出国。文革一起，革命委员会当然是老子的天下。

不过，无产阶级不但要解放自己，还要解放全人类。所以除了等待上一流大学或是出国之余，就是负责替校党委发现并甄别所有反动学生，这是责无旁贷的。如此这般的堂吉珂德式的英雄们纵横驰骋，出手不凡。他们认真地发现着每一个敌人，留意着每一个稍有不满的眼神。任何一个班级的负责教师鲜有不识相的，班干部团委会统统拱手交与他们，其后当然成了发动攻击的战斗堡垒。每一个班都顺利地找到几个反动学生。我所在的班发现的敌情是：一位平素爱咬文嚼字的迂夫子，想要称赞另一位同学学习毛主席著作努力，便在作文中写道这位同学在看一本“白皮、红框、黑字的书”。所谓“白皮、红框、黑字的书”乃是毛的文章单行本统一印刷格式。但迂夫子一言既出，驷马难追。红框尚可，毛主席的书岂能够是白皮，黑字！这乃是大不敬。自从各个班级有了这些活生生的准阶级敌人，对于还从来没有见过敌人模样的半大小子，自是兴奋异常。只等政治运动一到，便可开刀问斩了。这也是为什么文化革命初起时，学校中“出身好”的学生跃跃欲试，而“出身不好”的学生则噤若寒蝉的原因。试想，一个十几岁的学生，未经世事，无缘无故地赋予他任意羞辱他人的权利，他会如何享受这份快意；同样也是一个十几岁的学生，无缘无故地被逼迫逆来顺受，他又会如何承受这份屈辱。社会间人与人的仇恨便在这当时似乎天经地义的阶级斗争中植下了种子。

成立“红卫兵”的行动，四中的诸君没能拔得头筹，但是由于能够随时抢先得知中央的“精神”，所以也就可以另开风气之先，倒也随时点石成金，化腐朽为神奇。让我叹为观止的莫过于这样一件事。就在文化革命刚刚开始，也正值就要开始

大学升学考试之时，如何革命学习两不误，是摆在这些“革命小将”面前的一道两难题目。大约就在此时，他们之中的一些人得知中央已经决定废除高考，以全力大搞文化革命。于是连夜发动“倡议”废除高考制度。但四中高级干部的子弟太多，容易给人以口实，于是与女一中联系，一同“倡议”。事实上，已经入主革委会的诸君在学习上也并非十分平庸之辈，如果按照文革以前党的安排，大多数应有相当不坏的前途。但文革一到，他们早已得知这场运动非同小可，是干也要干，不干也得干，所以与其等待，不如捷足先登。就“倡议”废除高考制度一事，我当时还不十分理解其中的奥妙。直到听见革委会的一个委员打电话给女一中的人，大约那方面觉得这件事太大，有所顾虑，他便把底牌和盘托出，我这时才有如醍醐灌顶，感到有此法宝，真是攻无不克，战无不胜。后来我来到北美，还时常幻想如何结识葛林斯潘的公子，可以事先得知联邦储备会调整利率的消息。只可惜始终未能得手。

当然，人算不如天算，他们一个十几岁的学生又如何算得过革命大师，如若知道枪口是冲着他们的父辈，无论如何也不会这么办的。例如，就在大部份学生还在奋勇批判“三家村”，以为这一下总算抓到了修正主义的根子时，原北京市委大员如彭真等人以下数十人的子弟，利用全校的广播站播出一份当时令众人丈二和尚摸不到头脑的公开信，表示一定与父母划清界线，跟着毛主席奋勇前进。此后便从不介入运动。

如果说这是今日后门成风，腐败遍地的滥觞，那么它也有一个逐渐发生和发展的过程。

我还记得，在我从小学升初中的过程中发生过这样一件事。那是一九六三年。全市统一考试已经结束，大约判卷工作已经完毕，每个考生的成绩已经揭晓，静等录取了。我们班有位副总理的女儿，按说平时功课不能算差，但考得真是惨不忍睹。这也是胜负乃兵家常事。但当时我所在的实验二小应算是北京市不错的小学，考不上好中学是一件很丢面子的事。于是她的母亲就去找我另一位小学同学的父亲，因为他是师大女附中负责招生的校长。这位副总理的妻子据云是个很能干的人，她是如何委婉地阐述她女儿上师大女附中的必要性，我们已经无从得知，因为她在文革中已经非正常死亡。这位同学的父亲也已经在我到美国之后因病去世。但我这位同学当时在隔壁听了他们的谈话之后立刻跑到我家所说的话，至今我都记忆犹新。他父亲告诉这位女同学的母亲：“通知书已经都发出去了，把谁换掉都不好办。我这一辈子，招生只破过一回例，那就是毛主席的女儿李纳。”

其后的结局没有超出那个社会情况下的想象力，这位副总理的女儿当时没能被录取进师大女附中，而是按照成绩分配进一所不大好的中学。不过，大约一两个学期之后，她最终“转学”到了师大女附中，以致于二十年后还成为我们小学同学聚会中的美谈。当然，小学我们班的同学后来相继“转学”的也不在少数，但我还没有听说有强行入学的。就腐败而言，当年的副总理比不上今日新长征路上的突击手。

到了四中之后，又听到有这样的高招，最好的例子就是三年考不上清华的贺鹏飞（共军元帅贺龙之子，现在此人似乎已经封为将军了），依然留校再读，我记得他的铅球成绩倒是一直保持着校记录。最后，四中大约与清华作成一笔交易，把北京市乒乓球好手兼品学兼优的曹小平（“出身”有“问题”）与贺鹏飞搭配一同送入清华才算了结了这一桩公案。至于曹小平是否象《华夏文摘》上有篇文章讲的那样，请君入瓮，成了清华阶级斗争的活靶子，那就只有请曹小平本人来网上谈一谈了。

这与多年后有个什么省的公安局长，把别的犯人顶替他犯了死罪的儿子推上法

场，而其子出狱后居然评成个劳动模范，自然又不可同日而语。

革命永远是社会动荡的加速器，情况在朝着人们难以置信的速度发展。以我到四中不一两年之后，已经有了这样的局面：只要出身好，就是个笨蛋也可以上清华（当然是在四中的笨蛋，如果是在有的学校可能就要再根据成份换算一下可以合多少了），但成份有“问题”，就是样样超群也是枉然。说句老实话，等我上四中的时候，所谓“出身不好”的同学也已是凤毛麟角了。

回头来我们再说到四中的文革。四中在文革中的巅峰是与组织成立红卫兵纠察队分不开的。这就比清华附中发起红卫兵又技胜一筹了。如果说城外那些附中成立红卫兵还真有点解放全人类的雄心壮志（徐女士的文章似有这种倾向），那么四中孔丹等人纠合起西城区红卫兵纠察队，则完全是还没有搞清楚伟大导师意图的高级干部家长们最大的败笔。此一举不但使众多自家子弟深陷于众叛亲离的境地，也使他们从此只好走上艰险仕途的不归路。当时这些颇为自负的四中小子，十分看不惯连社会上的阿猫阿狗居然也戴上个红袖章来打家劫舍，简直反了。他们需要的“造反”是按照“等级”的造反，梁山泊上的座次早已排定，这个大秩序变不得，所以是很有必要来“纠察”一番。当然，各村地道都有各村自己的高招，父母显赫的孩子们无不在挖空心思如何才能显得高人一头。我还记得母亲的一位同事，其夫是个军事法庭的大员，她很是为他的儿子得意，告诉我母亲：“他们那些都只是普通的‘红卫兵’，我儿子是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但胳膊拧不过大腿，这位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不得已还是参加了红卫兵西城纠察队。后来，这位军事法庭的高官终于失势，定为叛徒。他的那位一辈子争强好胜的妻子也身患绝症。我到他家作客，看到这位从小与我还有些交往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那付落拓的模样，真替他不值。

正在红卫兵西城纠察队如火如荼地收编各路好汉，志得意满的时候，他们发现事与愿违，毛泽东发动这次“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的动机不是要攻击“成份不好”的，而是要整肃他自己身边的对手，也就是这些“当然好汉”自己的老子。这不但是绝大部份中国人始料不及，包括共产党的高级干部以及他们的子女也有如晴天霹雳。正如一位共产党的将军萧华歌颂毛主席老人家的诗歌中所言：“毛主席用兵真如神”。当然现在大家都清楚，这是明修栈道，暗渡陈仓之计，但是天机没有泄露之前，学校中的这些“毛主席的红卫兵”还是个个奋勇当先。我事后经常想，如若不是老毛把枪口对准了他昔日的“战友”，而是依了共产党的老办法，那么，一场运动下来，屈死鬼还不知道要增加多少。君不见，文化革命前刘少奇搞的那场什么“四清”，在农村就是一场血洗，平添了无数冤魂。

所以毛不久之后就发话了：警告有些干部“对这场运动很不理解，很不得力”。我还记得运动开始不久，经验老到的孔丹就搞了一个小政变，想把与他共事的薄熙永（薄一波之子，山西人似乎搞钱还行，权术不灵）搞下去，踢出革委会。薄熙永不好坚持自己一定要留在革委会，便一定坚持把刘少奇的儿子刘源源选进革委会。只见他声泪俱下地说：“我们不跟着刘主席干革命，难道跟着你孔丹干革命吗？”当然，跟着刘源源并不等于跟着刘主席，孔丹三下五除二就解决了这场战斗。听说，多少年之后，孔丹从监狱里出来，进了王光美的哥哥王光英办的官营“光大公司”，又技养难搔，想把王光英索性踢出去，于是便故技重演。只是这一回踢到铁板上，王光英的后台立即警告了他，于是他收心作了好人。前几日，还偶然在国内报导人大召开的新闻中读到，他和另一位当初四中革委会里也是炙手可热的人物秦晓，如今已成了公司的“老总”，并且被选为人大代表，如何西服革履，风度翩翩云云。说回来，此事至少说明，到了六六年的八月份，象国务院副总理这一层的人还蒙在鼓里，毛的枪口对准的是谁，全然不知。否则他老爸绝对不会让他的大公子到一个共党高级干部子弟云集的学校去貽笑大方的。

对联的式微是与毛横扫党内对手互为表里地同步进行的。随着党内“牛鬼蛇神

”的应声倒地，支撑对联的基础反而授人以柄，这是当初拿出这件法宝准备大开杀戒的人和已经准备接受精神和皮肉之苦的人都始料不及的。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成了原本已经完全没有还手之力的群体反败为胜，以其人之道反治其人之身的法宝。你爸爸反对毛主席，你爸爸就是反动；你爸爸反动，所以你就是混蛋。革命的发生一定需要互相仇视的两派，现在两派终于制造成功，可以搞一场革命了。而制造两派的催化剂竟然是这么一副幼稚、而且近乎粗鄙的对联。这恐怕连伟大导师也要击节称妙的吧？其后的发展应该是可以想象的：尸骨成山，血流成河。

然而，就是在劫难逃的恢恢天网也有异数。在险恶环境的夹缝中求生存的人，理解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伟大。我在云南农场曾共过事的一位朋友就属于这种先知先觉的人士。他的母亲曾嫁与一老资格的共产党员，后来又改嫁给丈夫的另一位“革命战友”。谁知这一模棱两可的身份在文化革命中可真是救命的稻草。革命的浪潮风起云涌，他这两位父亲此起彼伏，他于是就哪一位父亲升上去，他就声称哪一位是他的父亲。如此这般，从云南农场不用考试直接升成工农兵学员，然后毕业分配到中央部门。政治行情一直看好。八十年代初他被先期派遣到香港，成为“表叔”，以便一九九七年出头来接收这块英国人的殖民地。但直到和我们辞行的那一刻，尽管他时时提起他父亲此事中如何斡旋，我也一直没搞清楚他最后靠的是哪一位“英雄”的父亲而得以永远当着“好汉”不坠。。其间他曾回大陆省亲，和我们这些旧日的相识见了面恨不得第一句话就是：“香港，共产党管不了！”至于共产党管得了管不了香港我倒不敢置喙，但就凭他能够脚踩两只船，随时改换父亲的本事，我敢铁口直断：如果让他在香港接管某个共同基金，那一定是把好事。共同基金操盘最重要的金科玉律就是不要把自己的资本放到一个篮子里面。

十年长安忽一梦。革命的大潮平静之后，革命的遗孀终于又露出了水面。当年的人物今何在，往往可以作为我们评判政治事件以及它所造就的革命成果的依据。

比如说，当年口若悬河，鼓吹对联不遗余力而扬名海内的北工大的谭立夫，如今改了名字（不过就我所知，古代一般的好汉都是行不改名，坐不改姓），接替“六·四”时对戒严部队占据故宫颇有烦言而被罢官的院长张忠培教授，出长故宫博物院。只是不知那副对联是否准备列入馆藏文物。（谭立夫改名谭斌，见《红卫兵领袖抚今思昔》，载本刊 z k 9 6 0 7 b。据报导，克林顿总统上月访问北京期间，由谭斌负责陪同他参观故宫——编者注）记得八九年底我这第二次赴德国之前曾到张先生府上辞行，他仍旧一副君子坦荡的模样：“我相信党一定会搞清楚的”。我这后学晚辈自是不便多言，但我当时绝对相信：党是一定会越搞越糊涂的。谭先生的上任充份证明了，我这政治上一贯后知后觉的人有时也会有千虑之中的一得。

至于说到由于对联与政治双重压力而在当时不得不沉沦一下的四中骄子们，除了上文随便提到的孔丹、秦晓诸先生现在都已意气风发，决无下岗之虞外，还比较有印象的当属现今大连市长薄熙来了。记得落拓之时曾与其弟薄熙城（后来在北京开白孔雀艺术中心，又出掌北京市旅游局而名满京华，煞是风光了一气）偷辆汽车以发泄心中的愤满，这在当时是很司空见惯的。中国目前很有些名气的演艺界人士姜文先生，就曾根据自身经历导演了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不过当时薄氏弟兄两人却的确是被公安局押上四中操场的体操台，被乏味之极地批判斗争了一番。其罪行左不过是“老子反动儿混蛋”之类的说教。但平心而论，薄先生当时的风度也的确不能算太好，与今日在大连市的纵横捭阖简直不可同日而语。此一时，彼一时也。这就难怪，前几日在网上一份女性文学杂志中，读到有个女士似乎十分心仪薄先生的风度，还与台湾要竞选台北市长的马英九有上一比。要照这么下去，薄先生的政途还能看好，换句话说，还真又是“老子英雄儿好汉”了。

为了仗义执言，支持创办《中学文革报》的牟志京，当时四中人称“没治精”，一意孤行，险些与遇罗克一齐遇害。到了美国，拿了学位，到颇有名气的布兰岱

斯大学当了教授，但也依然改不了旧日的脾气。为了替几个中国来的学生讨公道，与校方吵翻了脸。最终是辞了教职，到 I B M 去作了研究员。不过尽可放心，犹太人是可能上法庭告你，但决不会开枪。各人都要扬长避短，发挥自己的特长。

推而广之，我们也看到许多可喜的现象。共和国主席的女公子在替洛克菲勒家族炒股票忙得四脚朝天；文革后期炙手可热的政治局常委的儿子在新英格兰推销三家庭的房地产也颇有心得。就是我所认识的一些当年“八·一八”在天安门城楼上被毛泽东拍着肩头的红卫兵小将们，不也正在北美这块“希望的田野上”“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争取六、七位数年薪的“更大的胜利”吗？经过文化革命的血腥战斗洗礼和资本主义个人奋斗的再教育，许许多多原本梦想靠着“世袭罔替”的轨迹升官发财的“好汉”与“混蛋”们终于明白了，靠着亲劳胼胝的努力，也同样可以实现“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呼唤民众进行革命时的许诺：楼上楼下，电灯电话。革命确是获取财富的手段之一，但看来不一定是最好的手段。

“别梦依稀咒逝川，故园三十二年前”。一九六六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距离我们已经这么长的时间了。每每谈及文革，真仿佛是白头宫女细说的前朝旧事。但这场梦魇，无论我们身在中国，还是西欧，或是北美，它总象一个魂未归位的幽灵出现在我们的睡梦中。无论我们自己是污辱和损害他人的，或是被污辱与被损害的，文化大革命给予我们这一代人最大的遗产就是对他人的仇恨，不管你是否愿意接受。

仇恨是革命不可或缺的力量，法国大革命是如此，俄国十月革命是如此，中国革命也是如此。革命可以得天下，但革命不能治天下。“文化大革命”是共产党内一场极其残酷，极其惨烈的山寨火并，并且殃及中国大陆芸芸众生这些无辜的池鱼。两败俱伤之后，山大王们握手言欢，重新排定座次，认识到：革命就是请客吃饭，不能那样温良恭俭让。又开始了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的逍遥日子。其中不少仁兄在高唱《社会主义好》的赞歌时还念念不忘“掀起了社会主义‘性’的高潮”。但是，以残害一批人而阿谀另一批人的冤冤相报，只会造成民不聊生，天下大乱。我们今天清理文革中出现的“对联”，反省“红卫兵”这样一只怪物，仍然“纠缠”于用今日的眼光来看近乎荒唐的事件，就是要清除我们心中被他人深植的仇恨种子。没有仇恨的社会才会有希望的社会。

∞ ∞ ∞ ∞ ∞ ∞ ∞ ∞ ∞ ∞ ∞

最高指示发表时

• 丁原 •

最高指示在基督徒听起来就是上帝的指示。可是从来没有一个活人敢自比上帝，除了毛主席。毛主席自命人民的大救星，他就是上帝，他的话就是最高指示，而且每一句都是，哪怕是梦话、屁话。

文化大革命中毛主席总是在半夜十二点发表他的最高指示。只要一听见广播电台发表毛主席的最高指示，不管你睡得多么香，也不管你多么困乏，男女老少都得从床上一骨碌就爬起来。有单位的，或骑车或走路连滚带爬地奔向单位，没有单位的就奔街道委员会。然后就是刷大标语，上天安门游行，庆祝毛主席他老人家又冒出了一句什么没头没脑的梦话。

游行当然不能只是走路，要手举红旗、画像、语录牌，胸前佩戴大像章，敲锣打鼓喊口号，吼语录歌，蹦忠字舞，深更半夜连蹿带跳地奔向天安门。

天安门前人山人海，锣鼓喧天。游行队伍有东行的、西进的、直走的、斜穿的。人们又是喊、又是唱、又是跳。那忠字舞，有的是边行进边扭边跳，有的就地围

做一圈狂扭乱跳。不知道是哪个街道的干部为了向毛主席表忠心，专门挑选了一群小脚老太太，披红挂绿地跳忠字舞。或许是那些银发老太太们表忠心表得似醉如痴，以至于显得有些头重脚轻，要栽跟头；或许是她们那三寸金莲停也停不住，站也站不稳，只见她们左摇右晃，前仰后合，两手似招魂，双足如捣蒜，果然是手舞足蹈，翩翩起舞。不过这幅画面与现代社会，现代政治显得那么不协调，真不知道那些老太太们的忠字舞是令人可敬可赞，还是让人感到可怜和心酸，而那被歌颂的东西是光荣伟大，还是可恶可憎可厌。

游行队伍中人人都在争风斗醋，胸前挂的像章越挂越大，有的像章大如马桶盖，走在游行队伍里，知道那是在争着向毛主席他老人家表忠心，要是走出队伍外的话，还真以为是反革命分子被挂牌示众呢；手举的毛主席画像也是人个比一个高，一个比一个大，这个举的是毛主席在延安戴红星八角帽，那个举的是毛主席握伞去安源……那些林立的绣像有的象旗，有的象幡，浩浩荡荡地就象张艺谋所拍的电影“菊豆”里送葬的那场面似的，不过更加壮观而已。

那时北京流行用窗纱绣毛主席的画像向毛主席表忠心，小的挂在墙上敬供，大的则举出去游行，且用一次就不能再用，就象给死人上供每次都得换新供品一样，重复使用就不能表示心忠，而那忠心又是永远也表不完的，你没听那时的一个顺口溜是这样说的吗：喊不完的口号开不完的会，表不完的忠心站不完的队，斗不完的私字赎不完的罪，写不完的检查流不完的泪……中国人的一幅时代倒霉蛋的样子。

绣画像的材料是要自己拿钱买的，我们学校里的许多同学都把自己生活费用的大部份拿出来买材料绣毛主席的画像。买了窗纱买绣线，买了镜框买竹竿。女人绣，男人也绣，没绣出忠心却绣出了血：画像绣了一个又一个，绣了一堆又一堆，结果人却饿得鸡皮蜡黄，摇摇欲坠了。

等到游行队伍回到学校时，已经是凌晨三、四点钟了，有的老教师才从家里步行赶到学校……有的人住家离校几十里远，不会骑车，平时乘公共汽车上班，此时大半夜没车，穿城又赶上游行人挤，虽然明知赶不上单位的游行，还是得硬从家里步行赶到学校，为的只是不要被列入了对毛主席不忠的另册。

夜里游行庆祝了最高指示的发表，早晨八点就得开始学习讨论领会精神，对照自己的思想斗私批修。那些家太远，游行后来不及回家的，就只好在单位里熬到天亮。你说毛主席他老人家半夜里发表最高指示累不累呀，多会折腾人哪。

寒冬腊月时，每天晚上睡觉前都要暗暗地向老天爷祷告一番。毛主席呀毛主席，你老人家发发慈悲吧，今天夜里可千万不要再说什么梦话，发表什么最高指示了，让我睡个好觉吧。祝你老人家早日安息。

□ 原载《新闻自由导报》第214期

~~~~~  
【研究报告】 or go to [the end of this last column](#) or [back to TOC](#)

〔编者按：本文为刘国凯著《广州红旗派的兴亡》中的一章。刘著全文刊载于《重新评价文化大革命丛书》第一辑《封杀不了得历史》，有兴趣的读者可在下列地址下载该文和其他有关材料：<http://www.nyct.net/~china/wenge.html>，或同 [china@nyct.net](mailto:china@nyct.net) 联系。〕

六六年夏——灾难向民众

• 刘国凯 •

## ◇ 刘邓在京城作为

一九六五年五月十六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下达，标志毛的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名的政治大清洗运动正式展开。六月二号《人民日报》刊登北大聂元梓等人矛头指向北大党委的大字报，并同时发表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号召不管黑帮“有多高的职位，多老的资格”都要把他们“彻底摧毁”。文化大革命的群众运动局面由此发端。

此时，刘邓一班中央大员是否洞悉毛的清洗意图呢？如果说这些在中共宦海沉浮几十年的老奸巨滑们至此仍懵然不知，那纯属欺人之谈。七月二十九日，刘少奇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大会上检讨说：“怎么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你们不大清楚，不太知道……我也不晓得。我想党中央其他许多同志、工作组成员也不晓得……有时没犯错误，人家也说你错了，是不是？那时自己也莫名其妙。”这些话无非是半泄愤半开脱自己。当然刘邓们或许未能很精确地猜测到毛的具体清洗目标和程度，但也会明白自己已处危境。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已被踹掉，而《五·一六通知》还说：“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的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在正睡在我们的身旁。”联系起六六年九、十月间毛在中央常委扩大会议上说：“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很可能，这是最危险的。”刘邓怎么可能对险恶的局势毫无警惕呢？针对这种情况，刘邓施展了他们的手腕，事实证明他们的作为是令人齿冷的。

相对于刘邓，彭真要有气魄得多。世事真凑巧，他与彭德怀同姓。

六五年十一月十日上海《文汇报》刊登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首当其冲的是《海》的作者、北京副市长吴晗。彭真应该是知道这篇文章大有来头，因在六六年九月毛就问过彭真：“吴晗可不可以批判？”这句话问得怪异，到底是指吴晗的观点是否谬误，应不应该加以批判，还是指吴晗此人系中共高干，颇有根底，能不能加以批判呢？这让听者自己去琢磨吧，毛语中用词模糊的高明之处正在于此。彭真回答：“吴晗有些问题可以批判。”这个答案也颇具功力。它的潜台词是，可以对吴晗口诛笔伐，但不应进行惩处，这无异于给毛碰了个软钉子。待到上海方面率先祭起批吴旗帜时，彭真竟敢于对抗，拒不转载姚文，后在周恩来的过问下才加编者按转载，力图把批判限制在学术讨论范围之内，并为吴晗设置保护网，强调吴的政治清白。六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毛与彭真、康生等谈话，彭真对毛说：“我们经过调查，没有发现吴晗与彭德怀有什么组织上的联系。”在这期间，邓拓曾对彭真说：“吴晗很紧张，他知道这次批判是有来头的。”彭真说：“什么来头不来头，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管你是什么人，是党中央的主席也好。”直至六六年二月八日彭真等人到武汉向毛汇报《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即《二月提纲》时，毛两次问彭：“吴晗算不算反党反社会主义？”彭真都不作正面回答。

彭真对吴晗的保护真是难能可贵。在中共高层的斗争中，一旦面临毛龙颜不悦，明哲保身是上上策。既然知道是毛要整吴晗，而自己充当吴的保护神，难道彭没有想到这样做会把祸水引到自己身上？为自保计，彭真完全有理由把吴晗抛出去，任由毛宰割，而自己求得平安。彭没有用上上策，他挺身保吴，究竟是出于义愤还是出于对当时党内局势的错误判断，过高地估计了刘邓的能量？这些，局外人不得而知。但我们了解到的是，彭尽力保护了吴，而在毛要踹掉彭时，却绝无人保护他。说来，吴晗含恨九泉亦应感到欣慰的是，他有那么一个为保护他而把自己也赔进去了的上司。

三月中旬毛决定把彭真为首的北京市一锅端。他大骂北京市委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从六五年十一月姚文发表，到此时已四个月，整吴一直整不下来。而三月中旬毛决定要整彭，仅一个月就把彭押上了祭坛。四月中、下旬，中共在杭州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彭与罗、陆、杨一起被整掉，并指控他们组成了反党小集团，撤消他们一切职务。

刘邓与彭截然不同，他们绝对奉行明哲保身之上上策，把彭真等抛出任毛宰割以求自身安康。但是这次他们的上上策没奏效，毛终究把大棒抡向了刘邓的天灵盖。

颇为值得探讨的是，刘周邓们能否团结一致，去保住彭，继而也保住自己？从中共党内形式上的票决民主程序来看，刘周邓们是有可能在政治局内取得多数而否决毛的某些动议。但这在操作上有一大困难，由谁提出与毛相反的意见并付于表决呢？谁也不敢率先提出，因为谁都不敢担保在自己提出动议后，其他人会随之跟进。要想取得成功，必须有事先的沟通，就象赫鲁晓夫搞掉贝利亚那样，但是在当时的中共高层，谁也不敢充当这样的角色。因为贝利亚根本不可与毛比拟，出于各种考虑，你所串连的对象都有可能把你的举动向毛汇报。暗中组织反对党中央主席的小宗派是会死无葬身之地的。暗中串连既有危险，单独发难又毫无胜算，于是乎在中央最高层，即使很多人心中对毛的作法都不满甚至反对，但却都不敢正面表露出来。

然而从前中共高层是有人对毛单独发难的。那就是五九年庐山会议上的彭德怀。彭的发难得到张闻天、黄克诚、周小舟的跟进。他们之间事先毫无联系，纯粹是发自内心。那时正是毛把经济搞砸了的年月，亦是一举请毛放弃权力的大好时机。没想到刘周邓等人不但没有帮彭一把，反而协助毛把彭打下去。从客观上来说他们是错失了良机，从主观上来看，他们是为了取宠于毛而从此卖掉了自己的骨格和灵魂，也从此在毛的面前站不起来。

中共巨头们各怀鬼胎，根本不可能团结起来。如果说在五九年他们尚不敢支持率先站出来的彭德怀，那么在经过几年也有他们一份的造神运动后，毛的神威已耀眼眩目之时，他们何以敢出来与毛对决？

既要顺从毛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又要保护自己，那切实可行的办法是什么呢？是抛出一个又一个的同僚去挨宰割，是把毛撩起的火引向无辜民众身上烧。

为此，它们抛出了彭、罗、陆、杨，抛出了北京市委，抛出北大、清华党委，事情发展下去他们肯定会抛出更多的部下。以至于把火往群众身上烧那就是搞第二次反右运动。

准确地说，这个第二次“反右”由两方面的内容构成：一是把敢于反工作组的师生打成“右派”，二是把大量无辜的知识分子、机关职员、工人群众打成“右派”。

随着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在《人民日报》上刊登，再加上该报又连续发表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等社论，北京各大专院校和一些中等学校的师生激烈地行动起来。他们纷纷把矛头指向本校党委或党支部。大字报、大标语贴满校园。内容无非是指控本校党领导执行了修正主义路线，反毛泽东思想，党组织里有黑帮之类，甚至召开批判党领导的大会。

针对这种情况，六月上旬，刘邓决定派工作组进驻各校，领导运动。这个决定显然是基于以下三个方面的考虑。一、尽管许多下级党组织及其领导人都会被刘邓们陆续抛出作牺牲品，但那必须是由他们有计划、有步骤地抛出，不能让学生去乱冲乱斗。二、学生们的乱冲乱斗不但会打乱他们的计划，任其发展下去还会产生难以控制的局面，会危及另一些并不准备抛出去的党内要员。三、出于中共政权的本能，他们绝对敌视、憎恶这类自发的不在他们领导之下的政治行动。

由北大校党委的倒台所产生的骨牌效应，使各校的党组织都抵挡不住来势汹汹的学生。而工作组就不同了，它是党中央派来的，它具有护身符和权威。工作组要把局势控制起来，要把学生们批前党委的行动纳入它所规划的形式和轨道，并以中央八条（内外有别，不上街，不游行等）作为约束学生具体行为的规范。

这样一来，矛盾就出现在激进学生和工作组之间了。前者指责后者“制造条条框框”，“束缚革命师生的手脚”，“压制革命”。校园里出现了攻击工作组的大字报，个别院校甚至发生了赶工作组的事件。对此，刘邓当然不会等闲视之，他们遂立即责令工作组展开“反干扰”运动。

“反干扰”运动的具体作法就是把敢于反对、攻击工作组的学生打成“右派”、“反革命”。刘少奇说：“说工作组是黑帮的大字报，是右派打着红旗反红旗。”这就定了调子。刘邓们还认定：在野右派感到气候已经适合，纷纷出笼，利用群众的革命热情，以极左面目出现，兴风作浪，遂决定在适当的时候予以反击。

“反干扰”运动于六月下旬展开，工作组的强势回击是激进学生无可抵挡的。工作组组织了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向激进学生压下去，声称“反对工作组就是反党”，甚至还组织了游行示威召开斗争其为首分子的大会。这一切以清华大学最为典型。激进学生的为首分子蒯大富（以后成为闻名全国的人物）被斗争后甚至在校内关押起来。斗争口号竟有“坚持打退反革命分子蒯大富的猖狂进攻。”刘少奇对激进学生切齿痛恨。他说：“要把蒯大富当活靶子打”，“批倒了他们才能巩固工作组的地位，资产阶级不给我们民主，我们也不给他们民主。”毕竟，占多数的学生是跟着工作组走的，因为工作组是党中央派来的。

就这样，在近一个月的“反干扰”运动中仅北京高校就有近万名学生被打成“右派”，“假左派、真右派”，“反革命”。

关于后来毛否定了派工作组的作法，指责工作组犯了方向性的错误，嗣后撤出工作组，这些都不值得详述了，而有必要探讨一下的是，如何看待有那么多的激进学生攻击校党委和工作组？

激进学生的这些行为来源于一种政治变态心理，这种心理是中共政权一手造成的。文革前几年间，中共对学生们大量贯输的政治思想教育是“阶级斗争”、“反修防修”、“解放全人类”、“做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等等。再加上“要做暴风雨中的雄鹰，不做温室里的花朵”那一类文学语言的熏陶，使青年学生在思想上产生一种将有大任降于身，将可为革命事业大显身手的潜意识。然而从这种翱翔的理想回到现实，他们发现自己的一切言行其实都处于深重的束缚之中。现实的生活是那么的平凡枯燥。尽管党也号召他们做螺丝钉，但这个号召则难在他们心中引起共鸣。干一番大事业才是他们的向往。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使他们心中存在着苦闷、不满、期待和躁动。这些心态对现存社会秩序具有反抗势能，而且这势能随着时间的延伸在不断地积累中。它在左右窥伺，寻找突破口和爆破点。

终于，这一天到来了。六月初《人民日报》的一系列动作点燃了导火索，火药桶爆炸了。中共政权尝到了由他们自己酿造的苦酒。

尽管成年人对青年学生的行动持保留态度，因为前者对九年前发生的“右派学生”攻击党而遭到严厉惩罚的事情记忆犹新，但此时的青年们并不以九年前学长们的遭遇为戒。事实上，学长和学弟们的言行也确有不同。前者是明明白白地攻击党的不民主，而后者则是指控党委还不够革命，在执行修正主义路线。然而这个区别在刘邓们眼中并没有原则的不同，都必须予以打击，顶多把前者视为正规“右派”，把后者名为“假左派、真右派”罢了。激进学生们在高呼“革命”口号的同时却遭到党的革命铁拳的重击，他们也在品尝自制的苦酒。

究其实质，激进学生的六月行动，就其主流而言（亦有学生从右的方面攻击党）并不具备积极意义。那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种政治表演欲的大爆发。其用以攻击校党委和工作组的理论是中共政治理论中最荒诞的部分，被其攻击的校党委其实是中共政权中最少体现专制实质的一环。六月十八日北大激进学生自行设置“斗鬼台”，对前校党委书记陆平等六十多名“黑帮”进行批斗。批斗中使用暴力，揪发撕衣，拳打脚踢，戴高帽，淋墨汁。首开文革暴力先河，可见这些激进学生当时的行为与民主理念追求和民主斗争方式风马牛不相及。

如果说刘邓们把激进学生打成“反革命”，“假左派、真右派”是事出有由，甚至可以说是激进学生们咎由自取，那么刘邓们在全国铺开、指导各级党委在无辜群众中大抓小吴晗、小邓拓、反党反社会主义右派分子则完全是中共政权一贯性暴戾行径的又一次展现。

在一般的机关、工厂、事业单位里，并没有民众敢于攻击本单位的领导和党组织（除非是党组织的头头之间有隙，各自动员自己的人马去攻击对方），因此并不存在反击的必要。但为了搞文化大革命，为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刘邓们还是决定把良民百姓赶上阶级斗争的祭坛。各单位的文化大革命领导权掌握在党领导的手中，他们组织先进分子们去揭发批判本单位里由他们内定的右派分子、反党分子。内定的依据是所谓出身不好，有政治问题，在过去历次政治运动中犯过错误，与本单位领导关系紧张之类。而揭发批判的内容则是他们日常生活工作中的言行举止。在此过程中，捕风捉影，夸大事实，无限上纲等整人手法都广泛出现了。被揭发批判的人明白此次运动领导是要把自己拿去交任务，得知大难临头，可怜惶惶不可终日。其本人乃至家庭都沉陷在惊惧恐慌的气氛中。

关于文革初期刘邓干的这个恶行，多年来中共及其御用文人都讳莫如深，仿佛由于刘邓在文革中被毛肃整，并遭到虐待，便应将其恶行一笔勾消。中国大陆官方所有文献中都不将历史中的这个章节独立叙述，也不单独统计在此期遭到迫害至死亡和伤残的人数，致使现在我们每个文革过来人尽管都对本单位的第二次“反右”留有记忆，但对全局却缺乏了解。

在许多非中共官方人士的文革著作中，也往往对刘少奇的遭遇抱以甚多的同情，而对成千上万的第二次“反右”的牺牲者漠然视之，不置一词。这种对贵族和平民的双重标准至今仍通行于世，想想也真令人心寒。

刘少奇值得责备的地方其实很多。四五年中共九大，他首先提出“毛泽东思想是党的指导思想，是全党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并将它写入党章、党纲。毛的个人迷信，个人权威首开局面，他有头功。故此也受到毛的宠信，地位逐步上升。论资历刘与周都是二二年加入中共，但论业绩功劳，刘实在差周甚远，但至八大，他地位已在周之上。五九年庐山会议上，刘对彭德怀大加斥责，昧着良心，不顾事实，戕害忠良。再看他在文革初期的作为，更令人齿冷。即使是从语言上我们也可以悟出他与毛本质上的相同。毛动不动就骂资产阶级，把一切他视为劣质的东西都认为是资产阶级的，如指责刘“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长资产

阶级威风，灭无产阶级志气。”而刘在痛骂一个小小的蒯大富时也说：“资产阶级不给我们民主，我们也不给他们民主。”区区蒯大富一下子成了资产阶级，这就是共和国主席的水平。毛刘在思想上、语言上何其相似乃尔！

#### ◇ 中共广东大员控制局势的措施

实事求是地说，五、六月间来自北京的消息使中共广东大员们茫无头绪。这次运动与以往各次确有不同，从前上头总有具体指示和计划安排。而此时往往要靠自己揣摸和理解，并多些向上请示。不过，虽然如此，他们仍有一个明确的信条，就是尽力控制局势。其具体措施无非是仿效刘邓的那一套，抛出一些下级同僚交差和把火往群众身上烧。

北京四、五月间，批判邓拓、廖沫沙的《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杂记》，广东大员便组织批判作协广东分会副主席秦牧及其散文集《艺海拾贝》，批判广东文联主席、作协广东分会主席欧阳山及其一系列作品。

北京五、六月间，中央主管政治宣传的中宣部长陆定一倒台，中南局于六月中旬决定撤消中南局宣传部长、广东省委宣传副部长、省委侯补书记王匡的党内外一切职务，并在中南局和省委多次开会批判他，指控他“一贯阳奉阴违、瞒上欺下，玩弄反革命的两面手法，打着‘红旗反红旗’，疯狂地反对毛泽东思想。在理论、教育、文艺、新闻、广播等各方面，顽固执行他的后台老板周扬一伙的反革命修正主义纲领……是广东省宣传文教战线上一小撮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总头目。”同期北京抛出了陆平等人，改组了北大校党委。七月初，中共广东省委也揪出了中山医学院的所谓“柯麟黑帮”，撤销该校党委第一书记兼院长柯麟的党内外一切职务，同时被抛出的还有副书记兼副院长刘志明，并宣称：“对这个黑帮的罪恶活动，广东省委早有察觉，并对他们进行了多次的批评斗争。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省委……自始至终放手发动革命的师生员工，对这个黑帮进行彻底的揭露和不断地斗争。”以后陆续倒台的还有广东省广播事业管理局局长田蔚，广州市宣传部长王澜西和市文化局局长华嘉等一些党内主管文化宣传的官员。中共广东大官在此期间整群众的情况也缺乏全面的统计资料。不过我们仍可从某些具体单位的情况推想全局。

《广州日报》，系广州市委机关报。由于该报社党委受到批判，工作队遂于六月中旬进驻该报社。开头，工作队罢了报社几名领导的官，接管文革和业务大权，接着便将矛头指向一般报社工作人员，按档案材料把他们分成左、中、右三等。中、右两部分人只作内部掌握，左派则公开指定，并让其协助工作队开展工作，“横扫一切牛鬼蛇神”。随着运动的发展，挨整群众愈来愈多。编辑部被划为斗争对象的有四十八人，占其总人数的一半。一般干部受大字报围攻者有七十几人，占其三分之一。这些人的罪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资产阶级新闻权威”、“反动文人”之类，其中许多人被戴高帽批斗。

《羊城晚报》社也有工作队进驻，大整报社工作人员。“假左派、真右派”和“三反分子”一类的帽子满天飞，其中黄伟经受迫害案可以说是一个整群众的典型事件。

黄曾于五十年代末被派往苏联学习，回国后与苏联友人通信，信中谈及国内经济困难和中苏分歧。这些信遭到中共警方截获，并对他暗中进行调查监视。文革开始后，黄立即被工作组列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的最佳人选进行揭发批判，并关押在报社牛栏内。中共广东大员把黄视为一个大猎物，力图把他定为敌我矛盾，彻底整死，以证明他们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业绩。“十六条”下达后仍继续迫害黄，直到六六年十一月黄才在北京南下的造反派红卫兵的干预下，获得从牛栏释放回

家。

在省市各机关单位中，大量的一般机关干部被围攻批判。据后来一些造反派红卫兵的小报披露，各机关挨整的人数多达三分之一以上，约十分之一的人被打成“牛鬼蛇神”。省直机关中被打成“右派”者达千多人，而各级当权派则少有被触动。这样，造成了一种无辜群众人人自危的恐怖气氛。在工厂企业和企业主管部门里，绝大多数领导都是趁此第二次反右的大好时机，卯足全力去整平时不听话的群众。有时为了凑数，出身黑类，有政历问题、犯过错误的人，当然都是在劫难逃的。

广州地区大专院校的学生不似北京的激进，故局面不太激烈。但官方对其中敢有异动者一样给予严厉打击。这其中的典型事件是华南工学院的《北京来信》。六六年六月下旬，华工学生高翔等人贴出《北京来信》。信上说除了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党中央外，各级党组织及其领导都可以怀疑、批判。这封信在中共广东大员和学生中都引起极大震撼。省委立即决定此信是反动的大毒草，并由学院当局连夜组织大批大字报予以围攻，指控《北京来信》是“反革命暴动的宣言”，“是裴多菲俱乐部反革命纲领的翻板”，同时布置人力对高翔等进行监视跟踪。省市公安机关也展开对他们的侦察，其侦察范围扩展为与此有关的学生、教师、一般职员达二百多人。

广州中等学校里的文革运动也很能说明中共大员们把火往无辜群众身上烧的恶劣行径。

刘少奇曾作指示：“中等学校文化大革命的任务是审查教职员队伍。”“中学文化大革命八月份解决三分之一，九月份再完成一半。中学老师要集中交待问题，象四清中公社开三级干部会一样。”

六月十一日广州市委召开全市中学教师大会，要求教师们行动起来，同学生们一道，横扫教育界的一切牛鬼蛇神。这次会议预告中学老师的恶运将临。不久，市委派工作组进驻各校，矛头就是整教师，即刘少奇所说的“审查教师队伍。”中学教师的遭遇比机关、工厂里的群众更惨，因为他们面对敢于肆意妄为，不考虑后果的中学生。中学教师中被打成“牛鬼蛇神”的比率比机关、工厂更高，所受的待遇也更恶劣。学生在批判斗争他们时，往往进行体罚和人身侮辱，这使在学生面前一向师道尊严的他们犹难忍受，这也造成中学教师在文革初期的自杀率最高。

广州四十五中学的事件生动地展现了中共广州大员的统治权术。

六月初该校初三学生刘肖芳（女）串联同学组织“保卫毛主席、党中央‘五四’战斗小组”，并贴出大字报批评校领导阻止学生向老师提意见，从而更受到校领导压制和组织其他学生加以围攻。后刘肖芳向市教育局投诉。广州市委获悉此事后，经过研究派工作组进驻该校，并宣布该校党支部书记蔡三坚为“反革命分子”，撤销其党内一切职务，还由共青团广州市委授予刘肖芳“模范共青团员”称号，在报纸上报道她的事迹，号召全市青年学生向她学习。

把刘肖芳与高翔加以对照可以悟出其中的奥秘。高翔是党员，刘肖芳是团员，按说高比刘有更多的政治保险系数。但由于高的《北京来信》是号召怀疑除党中央外的一切党组织，即省、市委都在可以怀疑批判之列，而刘只是反本校党支部，在受到压制时向市级党组织求援。因此，在中共省、市大员感受上，高、刘完全不同。他们立即作出压高捧刘的政策。压高用以保省、市委，捧刘亦可以此塑造抬高省、市委一贯正确，支持学生革命行动的光辉形象。只是可怜蔡三坚成了牺牲品。他作为一个中共基层官僚，熬到中学党支部书记的职位也不容易，按贯常法则他的做法也并无不妥，但没想到情势突变，老皇历不合用，他仅仅因禁止一个十几岁的初

中女学生冲撞师道尊严，便被强力从书记的宝位上掳下来，并扔进“反革命”的深渊。想必在他看来世事真是荒诞到令人不可思议的地步。中共广东大员们为控制局势手段之狠毒狂乱由此亦可见一斑。

然而，尽管中共广东大员在控制局势上，竭尽全力，使出全身解数，但毛泽东神威在上，刘邓尚无力抗拒，他们又何能挽回局势？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蔡三坚的今天即是他们的明天。当然他们之中的许多人还是会否极泰来，有光明的后天。

#### ◇ “血统论红卫兵”的业绩

刘邓与中共各地大员搞第二次反右给无辜民众带来的灾祸还没有过去，另一场更暴戾的灾难又向无辜民众。这就是“血统论红卫兵”搞的“红色恐怖运动”。

“血统论红卫兵”组织萌芽于六六年六月间北京的几间中学，其中清华附中为首开先河者。该校红卫兵于六月二十日、七月四日和七月二十七日抛出了“一论”、“再论”、“三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见本刊 z k 9 6 0 3 a ——编者注）内容除了政治狂热的叫嚣外，丝毫没有深刻的积极内容。开头，这些组织受到工作组的压制，并强令其解散，但很快，毛获悉这一情况，于八月一日写信给清华附中的红卫兵，对他们表示热烈支持。狂热的红卫兵运动由此轰然炸开。

一党专政的中共政权，绝对不允许有任何自发的政治组织产生，即使参加者是中共干部子弟，即使所打旗号是忠于共产党，忠于毛主席也罢。工作组是按照常规惯例把红卫兵组织视为反革命活动。然而毛此时的思维已大异常态。他就是需要煽动起青少年更多的个人崇拜来为他的政治清洗效力，故此他不但容忍还不惜以一个党主席之尊写信给十几岁的小孩力表赞赏。果然，他的心机没有白费。八月十八日毛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百万红卫兵，把青少年对毛的狂热崇拜推向更新的高潮。本来，青少年们的这些狂热情绪若不危害正常社会，倒也无关紧要。就象八、九十年代让球迷、歌迷、追星族们自己去叫个够，跳个够好了。但是当年的红卫兵狂潮一形成就立即朝向无辜民众。

红卫兵狂潮的第一波行动是“破四旧”。对此，林彪有着难以推卸的责任，因为他在八月十八日的大会上号召红卫兵起来“大破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当然，从当时气氛看来，没有林的这番讲话，红卫兵运动也会走上这一步，但林的讲话至少起了催化、加速、鼓励的作用。“破四旧”经过多年来所有文革研究者毫无异议的一致谴责，其内容早已为大众所熟知。它主要还是毁物没伤人，从改街名店名、院名到取缔“资产阶级”发式，服饰，击毁带有封建色彩的历史文物。这一切固然对社会生活带来极大困扰纷乱，对社会遗产造成极大损伤，但究竟没危及人的生命。然而，只短短的一个星期左右，“破四旧”迅速地演变为残暴的虐杀人身体的“红色恐怖运动”。

“破四旧”和“红色恐怖运动”主要是中学生所为。而“红色恐怖运动”则是中学生中的“血统论红卫兵”的业绩。“血统论”以“鬼是愁”对联为前锋急速膨胀。“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在七月二十九日出现于北航附中，几天之内风靡北京全城。以革干革军子弟组成的“血统论红卫兵”自视出身高贵，理应叱咤世界，他们不满足于对物的毁损。革命的对象在他们看来应是人而不是物。故此随着“鬼对愁”对联的疯狂叫嚣，“破四旧”升级为“红色恐怖运动”。不久前与他们一起去“破四旧”的非红五类出身的同学被他们扔掉，黑类出身的同学则更是遭到他们的辱骂、殴打。

“红色恐怖”的主要内容是抄家、关押、游街、殴打。其对象是“黑五类”、“资本家”、“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等。抄家是查抄从前的“吸血鬼”所收藏的金



银珠宝，“变天账”，妄图进行反革命暴乱用的枪支弹药。（文革前的不少文艺作品凭空描述有许多地富、资本家暗中藏有地契、账单和武器。）关押是在学校里设立的“牛栏”，把捉来的“牛鬼蛇神”监禁起来。

“血统论红卫兵”的暴行是极为令人发指的。它应该受到人间正义的永远谴责。我们实在无法想象有什么理由要对自己无仇无怨、毫无反抗力，匍匐在脚下的弱者施以鞭抽棒打，甚至活活打死。这种万分野蛮的行径是古斯巴达人和希特勒党卫军都做不出的。据以后的统计数字，“红色恐怖运动”中北京有1,700人被打死，当有许多倍于此的人被打伤。这么多人，用枪击毙也颇须时辰，而用棍棒打死那将是一个多么漫长的血腥过程啊！这个“业绩”“血统红卫兵”做出了。四人帮倒台后，有人把这一切的主要责任推在谢富治在市公安局的一次会议上说：“群众打死人，我不赞成，但群众对坏人恨之入骨，我们劝阻不住，就不要勉强，”“民警要站在红卫兵一边……把五类分子的情况介绍给他们。”毋庸置疑，谢确有很大罪责。然而就算是谢暗示共警把街道黑五类的资料透露给红卫兵，但具体打死人还是“血统论红卫兵”的自主行为。从法律角度作眼，打死人是行凶者的个人罪责。从政治和社会制度上考量，这完全是中共专制政权孕育出来的罪孽。多年来，中共对在校学生大量灌输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教育，毫无根据地极度夸大从前的对立阶级成员对中共政权的仇恨和反抗，同时又极力渲染赞美中共革命的艰难与辉煌。这就养成了中共官僚子弟血统优越感和骄横心态。以父辈的光辉成就骄傲，又对“阶级敌人”有无端的刻骨仇恨，并以当然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身份自居，渴望自己也为革命事业立下功勋。国民党政权远在湾海峡对岸，那么向谁来发泄对阶级敌人的仇恨？通过向谁实施革命手段来继父辈之后建立自己的革命功绩？只有向眼前能捕获到的“黑五类”了。他们把敢于活生生地将“阶级敌人”、“牛鬼蛇神”殴打至死看成是“阶级立场坚定”，“革命精神强烈”的具体表现。中学生打人远比大学生残酷，这里面除了从人性恶的角度考量，16～19岁的青年身上较20～25岁的青年具有更多人性恶的因子这一次要因素外，（全世界的刑事案件统计资料表明，20岁以下的青少年暴力犯罪尤为严酷，并具突发性）主要的还是当时大学生里高干子弟十分有限。中共官僚阶级除元老级外，大多数“土地革命”时期和抗战期间参加的干部，其子女此时都还就读于高、初中或小学。

广州的“破四旧”和“红色恐怖运动”也于八月下旬展开。若以北京作参照物，广州“红色恐怖运动”的严酷性轻得多，但若以正常社会生态对照，“血统论红卫兵”的暴行也是惨绝人寰的。他们在学校里殴打老师和出身黑五类的同学。在社会上到街道居民组里按派出所提供的资料，抄“黑五类”的家，并肆意殴打，再把他们押送原籍，打人最凶的学校也就是高干、军干子弟比较集中的学校。如六中、铁中、七中、八一中学，二十一中。二十一中地处市区北部边缘。学校操场后面便是山丘、乡村。该校“血统论红卫兵”从附近村庄里抓了地富分子回校关起来轮番殴打，并不给食物和饮水。一名六十多岁的老地主很快被打死，另一名中年体壮的富农熬了几天也终于带着遍体伤痕赴往黄泉之路。“血统论红卫兵”把打死人根本不当一回事。当被打死的地富的子女象幽灵一样一声不响满脸惊惶地来搬走尸体时，“血统论红卫兵”们还在附近骂骂咧咧：“他妈的！”“把这些黑五类都打死才好！”

除正牌“黑五类”外，中学教师、文艺界人士的境地也极惨。他们之中极高比率被打成“牛鬼蛇神”，被剃阴阳头、挂牌、游街示众。有许多人白天被赶去做重活，晚上关押在牛栏。“血统论红卫兵”动辄殴打他们，罚跪煤渣，强迫学牛叫，不从者施以毒打。著名粤剧演员红线女，罗家宝等都被剃阴阳头，关牛栏，罚扫大街。广州在“红色恐怖运动”中究竟有多少人被打死或打伤至残，当局不作统计，或统计后不予公。因此，难以掌握具体数字。但从笔者所知的几间中学里都打死了人，可见这类暴行也是相当普遍的。中共大员们推行第二次反右，戕害大量无辜民众。其子女则大搞“红色恐怖运动”更凶残地虐杀无辜民众。他们两代人对人民、

对文明共同犯下了罄竹难书的罪行。

文革结束后，有许多文艺界人士谈及那段恐怖的岁月，心有余悸也愤恨万分。他们一致痛斥红卫兵、造反派的凶残暴行。这真令人困惑万分。难道他们真的不知道红卫兵有“血统论红卫兵”和造反派红卫兵之分？难道他们真的不知道一般的造反派在那时还没有出现？广州以非红五类子弟为主体的造反派红卫兵在那时还被“血统论红卫兵”骂为“骑墙派”、“狗崽子”，甚至受到殴打，根本没有资格参加红卫兵。他们也是“红色恐怖”的受害者。这些人士把石头扔在无辜者，甚至是自己同是受害者的身上，难道不觉得心痛？深究一层，这里面另有隐情。因为当年推行第二次反右的中共大员们，几经起落，终于有了“光明的后天”，他们官复原职，权势有加，接着便是由他们来给当年的文艺界人士平反补偿，从复职到补薪，配给宽敞住房，安排良好的疗养条件等等。这当然使后者对前者感激有加。文艺界人士亦属干部编制，文艺某级可以参照行政某级享受特殊待遇，且他们两者在文革期间又都具有被贬的经历。凡此种种，恍然间，后者似以前者为自己的同类。于是乎，他们在回忆起昔日的惨痛经历时，便刻意不去指证真凶——前者的子弟，而把满腔怒火倾泻在无辜者身上。呜呼，难道这就是中国文化人的高风亮节？

---

Now go to [the previous Zeng Kan issue](#)  
or go back to [the TOC of this issue](#)  
or go to [the next Zeng Kan issue](#)  
or go to [the index of all available issues](#)  
or go to [the end of this last column](#)

---

|           |         |                                                                |
|-----------|---------|----------------------------------------------------------------|
| 本期责任编辑：   | 华新民（美国） | <a href="mailto:cnd-cm@cnd.org">&lt;cnd-cm@cnd.org&gt;</a>     |
| 本期 校对：    | 钟 超（美国） | <a href="mailto:cnd-cm@cnd.org">&lt;cnd-cm@cnd.org&gt;</a>     |
| 读者技术咨询：   | 荣 刚（美国） | <a href="mailto:cnd-help@cnd.org">&lt;cnd-help@cnd.org&gt;</a> |
| 网络技术维护：   | 张雨田（美国） | <a href="mailto:cnd-info@cnd.org">&lt;cnd-info@cnd.org&gt;</a> |
| 《华夏文摘》主编： | 李彤彬（美国） | <a href="mailto:cnd-cm@cnd.org">&lt;cnd-cm@cnd.org&gt;</a>     |
| 《CND》总编：  | 熊 波（美国） | <a href="mailto:cnd-cm@cnd.org">&lt;cnd-cm@cnd.org&gt;</a>     |

---

订阅（或停订）《华夏文摘》请寄： [LISTSERV@UGA.UGA.EDU](mailto:LISTSERV@UGA.UGA.EDU)（GB 版）  
并请注明： SUB（或 SIGNOFF） CCMAN-L FIRST LASTname  
或寄： [LISTSERV@BROWNVN.BROWN.EDU](mailto:LISTSERV@BROWNVN.BROWN.EDU)（HZ 版）  
并请注明： SUB（或 SIGNOFF） CNDBRU-L FIRST LASTname

停订命令不必加 FIRST LASTname

---

其他获取或阅读《华夏文摘》的途径：

无记名文件存取（FTP）：[ftp.cnd.org](ftp://cnd.org)[207.151.78.100]：pub/hxwz  
或 [canada.cnd.org](ftp://canada.cnd.org)[142.132.12.100]：pub/cnd/  
hxwz

万维网服务站（WWW）：<http://www.cnd.org/HXWZ/>

---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